

仰望高山——1955年8月25日中大纪事

文/姜伯勤



岑仲勉先生(1886—1961)工作照

1955年8月25日，一个晴朗的夏日，是我初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年级报到后的第二天。高班的学长带领我去到陆佑堂附近的一间讲堂，参加岑仲勉先生七十大寿的祝寿会。

会议由历史系教工会代表丘陶常老师主持。致辞后，将一面“学不厌，海不倦”的锦旗，赠呈仲勉先生。然后由仲勉先生平山堂住处的邻居曾纪经先生报告寿星的事迹。

平山堂在文明路中山大学老

校址之大钟楼下，那里是前清的考场，到1955年还可以看到科举考试时生徒坐下考试的长桌长椅。曾先生介绍了岑老师的生平。1930—1934年岑先生主持圣心中学教务，1937年7月进入中央研究院。

曾先生说，在平山堂平房宿舍，每日早餐后，岑先生家人将四方餐桌擦干净，先生就在方桌上编写《突厥集史》，用功至勤。曾先生还说，仲勉先生早年在业余时间研究植物本草，今天将50万字

的植物本草的研究稿本，赠予华南植物园研究机构保存。

仲勉先生本人也在会上对此次赠出50万字的植物本草研究的举动，抒发了感慨，说道：

“现在自然科学的进步，比我年青时，是大步前进了。相比起来，在史籍整理方面，和我年青时比起来，进步却不那么大。”

当年17岁的我，听了这席话十分震动。从我后来跟随岑老师学习的经历中体会到，老师这段话不是针对五四运动以来整个新史学的进步情况说的，而是就某些史籍的整理方面，通过与嘉乾道咸以来的国学和西洋汉学的某些部分的比较而言的。

在1955年8月25日这次历史系全体老师同学举行的敬老尊师大会上，仲勉先生盛赞“今天的根治黄河方案才是真正伟大的创举”。先生以热爱新社会、配合经济建设的饱满热情，自觉地在近代研究遗产的基础上研究黄河史。先生在会上说，在过去历史上所谓治河最著名的例如东汉王景、明朝潘季驯、清朝靳辅等人，他们也只能管到河南中部，并且也只能碰到决口，堵住决口便了，而他们的成绩比起今天来简直是差得太远了。

正是以这样饱满的爱国热忱，先生于1952年夏终于完成了《黄河变迁史》54万字的大著，并于1957年在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。

正是在这次祝寿会上，先生在谈话中亲切关怀青年一代。他说：“老一辈应尽心带徒弟，后一辈也应虚心跟师傅。”

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从此我就在心中把仲勉先生当作我的师傅。第二天，8月26日，我起了一个大早读外文，下午又努力读古文，从此以后，在大学毕业前的几个寒暑假中，我都留在学校读书，上午读外文，下午读古文，晚上读时文。到了1959年大学毕业时，我幸运地考上岑仲勉先生指导的唐史研究生。

1959年12月的一天，先生的助手陈达超老师带我到平山堂宿舍去向先生报到，去到一间平房，墙上挂着1955年8月25日全系师生赠送的那面“学不厌，海不倦”的锦旗。仲勉先生指导我，作为隋唐史研究生，先要把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三样对照阅读，把不同处、有疑问处、有心得处写下来。

那时隋唐史的两任大教授，一位陈寅恪先生双目失明，一位岑仲勉先生双耳失聪，所以，我每

周去汇报学习时，都要以书面方式汇报学习。我虽然每周交一篇，但所说问题常常是过大，且所引证材料往往是从所读各种论文中转引而来，因而岑先生看了后，往往就放在了一边。

仲勉先生在《隋唐史》之第三十八节《租庸调及杂征徭》一节中说：“近人论租庸调者或以为与均田无关”，“但如就唐之租庸调法来看，都未免流于片面”。又说，“授田常不足数，则租调实征之数，不能不设法调整；户等即调整之方法”。这些论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。一天，岑老师令我写一篇学习心得，并口授了几条相关材料。待我呈上学术心得时，我又添加了几条我自己去找到的相关材料。岑老师读了颇有喜色，并对我大加鼓励。

从岑老师对我们上交的学习心得的褒贬中，使我逐渐懂得要脱离大而空的学习方法，要脚踏实地地前进，我从中所受到的教育，指引着我终身的学习道路。

回想我跟随仲勉先生学习的经历，我的心中，不断仰望着这座高山，并决心用终身不倦的学习精神，来报答我们的这位恩师。

(本文原载《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》，2004年。)

访陈寅恪教授

文/梁诚瑞

初到中山大学，校园到处是茂郁的绿树竹林；几乎无处不是草地，无路不是林荫，尤其路旁几株古老的大榕树，盘藤结葛，壮垂美丽，高高地伸开四臂，浓密的树叶像托着一片片苍苍的碧云。

在办公楼前，陈序经副校长指着对面一幢红色的洋楼，告诉我们：“那就是陈老先生的家。”望去那景致十分幽雅，几株南方特有的棕榈树，佇立在楼角，枝干高过屋顶，梢头棕叶有如一柄巨扇，兀自在摇曳，似乎怕那南国的热风闷坏了小楼的主人。门前的两株木兰花，在北方难得见到有长得那么高大的。一条小路就



陈寅恪与夫人唐篔漫步于寓前白色小道

横在树下。

陈老先生自从来到广州，一向闭门深居简出，他那多年失明的双目，现在在阳光下，只能模糊地辨别外界的一点影子。中山大学为他特地修了一条小路，路面上涂了几层白灰，为的是使陈先生隐约地知道那里是路。人们也只有在这小路上偶尔看到这位人人尊敬的长者，闲适地漫步。

我们来在小楼下，果然门上贴着一副对联，写着：

“万竹竞鸣除旧岁 百花齐放听新莺”

(按：新莺指广州京剧团一位京剧演员新谷莺。)

多年不见他的墨迹，如今看到陈老先生的笔迹如故，便觉十分亲切。走进他的客厅，我留心注意那雅致的布置。一幅马衡先生题字的中堂悬挂在壁上，含着多少故人深厚的友谊。一座玻璃书柜满是唐宋诗词集子，有两瓶含笑怒放的鲜花，点缀着小小的书斋，呈一股勃勃的生气。我想这些东西一定是陈先生所最喜爱的。

陈老先生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客人，扶着手杖从书斋走出来。虽然他看不见我们，而我们却看见了这位离开北京七八年的老师，很高兴，心想，北京的老师们又是多么怀念着您老先生呀！他那黑色的短发已渐露斑白，而神

色很好，丰采依旧，精神上是很开朗的，并不像已六十七岁的老者。

我们问候他：“您老近来可好呀！”

他说：“我的肠胃不好，睡觉不好，一动就不消化。”又说：“好吃的东西就不能吃，勉强吃了一定不好，所以凡我觉得不相宜的东西，我就绝对不吃。”

陈老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。谈起二三十年前的往事，历历可数，那年那月都记得那么清晰。他连连问到北京许多故友的近况。他关心地问起：“俞平伯还好吗？”“他在苏州的房子还在吗？”“他还是住在那个老地方吗？”“现在他还写字不写字？”“他那个房子是不是它一家子住？”许宝骥同志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，他听了很觉安慰，连说：“那就好了！”“那就好了！”

他又问起：“向觉明（达）你们常碰见吗？”“他的家眷还住在那个地方吗？”“他在城里办公，有地方住吗？”“王宪钧、沈有鼎还在北大吗？”“钱钟书现在在那里？”“金龙荪（岳霖）的眼睛怎么样了”。想起沈有鼎，他说：“我和他一齐到英国去，那时我们还住在一个宿舍里呢！”他是多么挂念着老北大、清华的战友。我们为了让他老人家多休息休息，不敢久扰。临别时，他一再握手，要我们问候今在北京的北大、清华



陈寅恪先生在寓宅二楼走廊开课(1957年3月8日)

的朋友们好。

陈寅恪先生的战友们一定也很愿意知道他老先生的近况吧！

据我们所知，这几年，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没有停止。中山大学专门派有两位助手帮助他工作。他的论文常常发表在中山大学的学报上。我看见今年中山大学学报第一期上就刊行一篇“论唐代的番将和府兵”，是他的新作。据说，他还有些未发表的文稿。最近研究弹词，再生缘，已写好一篇文章，因为还要再修改，不肯轻易示人。目前，他还要研究柳如是的事迹，关于中国历代女子梳装的样式，他也很感兴趣。

他还和历来一样，在家里开课。中大有位副教授正在跟他专修隋唐史。

他在广州生活上受到学校党政特殊的照顾，同学们也都很尊

重这位前辈的学者。每天有人为他读报。他最近极爱听京戏，可惜广东京剧团演出的比较少。今年春节，广州京剧团主要演员被邀到中大作过一次清唱演出，难得陈老亲自出门去听赏。当他高兴地听罢归来，立即赋诗三首，还兴致勃勃地拟对联一幅，赠给这个京剧团。而尤其赞赏剧团中新谷莺、华兰苹两位演员。对联是这样的：“古董先生谁似我，新花齐放此逢君”。(按：古董先生，古作“陈”解，指他自己，“董”指中大教授董每戡，因为看京剧时，有董君陪同。此句出自桃花扇曲词。新花齐放，“新”指新谷莺，“花”指华兰苹，“花”与“华”通，新花齐放取百花齐放意。)

(注：文章来源于《光明日报》1957年5月10日，略作删节，作者系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记者)